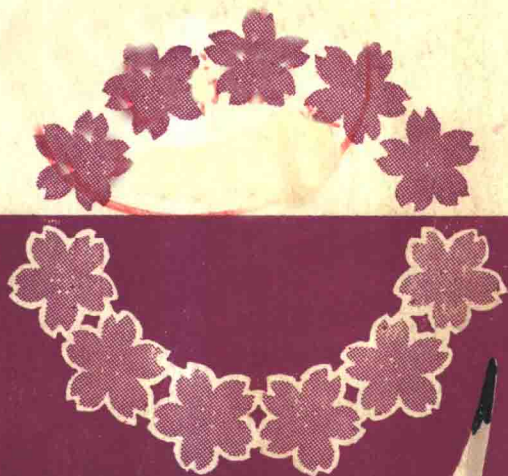


XIAO SHUO XUAN

日本当代短篇小说选



辽宁人民出版社



日本当代短篇小说选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 1/4 插页: 5

字数: 470,000 印数: 1—85,000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90·286 定价: 1.75 元

日本战后的短篇小说

(代序)

李德纯

—

从十九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军国主义曾经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横行了半个世纪以上，给日本民族和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后，许多作家冲破军国主义的长期禁锢，纷纷提笔，揭露战时的黑暗生活，暴露法西斯势力造成的阴暗面，以激发广大日本人民对军国主义的仇恨，目的在于让人民深刻认识军国主义祸国殃民的罪行，永远牢记日本历史上这一惨痛教训，从而使军国主义横行的历史不再重演。这是历史赋予文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广大读者的迫切要求。在这方面，短篇小说的成绩是引人注目的。

战后初期，许多作家迫切要求在作品中倾吐他们在风雨晦暝年月的痛苦和悲哀，没有充分余裕构思长篇，造成了短篇小说的繁荣局面。战后初期进入文坛的“战后派作家”的活动，博得了读者的重视与好评。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野间宏、椎名麟三、梅崎春生、大冈昇平等。“战后派作家”在军国主义统治的黑暗岁月中断送了青春，或因参加进步活动身系囹圄，备尝法西斯警察

的摧残与迫害,或被征兵驱往侵略战场,心身饱受创伤。他们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接触了广阔的社会现实,从本身的经历开始,逐渐看清了军国主义的罪行,产生了对现实的愤慨不满。他们把犀利的笔锋指向了专横强暴的军国主义,怀着激愤的情思,描述了战火中的社会惨象和人们的精神创伤,提出了广大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表现的思想 and 感情同人民大众是息息相通的。野间宏的《阴暗的图画》(1946)和《脸上的红月亮》(1947)是“战后派作家”短篇中的代表作。这两篇小说在刻画侵略战争对人的生理和心理方面造成的恶劣影响,有其特色。“战后派作家”这类题材的短篇小说不胜枚举,比较著名的还有梅崎春生的《樱岛》(1946)、大冈昇平的《俘虏记》(1948)和《野火》(1948)等。这些短篇都揭露了日本士兵辗转呻吟于日本军队内部黑暗制度折磨之下,面对战局节节失利,战败已成定局,陷于无法逃脱的悲观绝望。《樱岛》以日本军国主义覆灭前夕的1945年为时代背景,描写驻扎在鹿儿岛南端樱岛上的一支海军部队的惶恐不安,反映了普通士兵的厌战情绪。《野火》描写外界事物在人物内心的反应,刻画侵略军队在菲律宾战场陷入弹尽粮绝情况下,自相残杀吃对方身上肉的情节,烘托出日本军国主义的日暮途穷和它的野蛮性。

一些战前素负盛名的老作家,也拿起被迫搁置多年的笔,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军国主义,刻画了日本人民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积极主题。如女作家野上弥生子在短篇小说《狐》(1946)中,描写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自“九·一八”事变后就一贯反对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太平洋战争前夕,他不愿应征作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借口养病,躲到农村养狐。但想到肺病“一旦痊愈,又会被拉去打仗,便产生绝望”,甚至认为因病死去反而是一种“轻松的诱惑”。其他老作家如林芙美子在《漩涡》(1947)中,

描写了阵亡士兵妻子在战后的举步维艰生活，正宗白鸟的《战争受害者的悲哀》(1946)刻画了知识分子在战争年月的乱离疾苦。这些短篇都把战时生活描写得那样愁惨，无非是揭示法西斯势力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从而对军国主义的穷兵黩武政策发出控诉和谴责。尽管小说中的人物反对战争的态度一般比较消极，但在法西斯白色恐怖之下，也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并伏鱒二的《遥拜队长》(1950)和田宫虎彦的《画册》(1950)堪称代表作。《遥拜队长》通过一个下级军官冈崎悠一的病态行动，写出了比较深刻的社会内容，表现了作者的艺术手法和思考问题的敏锐性、深刻性。这个短篇虽然没有直接描写军国主义奸淫掠夺的罪行，却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其流毒和影响如何腐蚀麻醉和毒害人们的灵魂，而这恰恰是在战后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的日本严重障碍。通过文艺作品揭示出军国主义毒素较深的人物特征，塑造这类人物的典型形象，对于肃清军国主义流毒是大有益处的。《画册》则从另一侧面，对军国主义提出了血泪控诉。作者用哀婉凄厉的笔法，刻画了中学生福井义治一家遭受军国主义迫害的悲惨遭遇。福井义治还只是一株需要阳光雨露滋润的幼苗，却遭到腥风血雨的不断袭击。侵略战争卷走了他幸福欢乐的童年，使他承受着战争浩劫的深重灾难。仅仅因为哥哥在侵略战争中作了俘虏，全家就陷入被欺侮的绝望深渊。作者使用艺术手段强化揭露军国主义造成的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悲剧气氛。十八世纪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狄德罗说过：艺术“所要争取的真正的喝彩不是一句漂亮的诗句以后陡然发出的鼓掌声，而是长时间静默的压抑以后发自心灵的一声深沉的叹息。……是使全国人民严肃地考虑问题而坐卧不安”。《遥拜队长》的冈崎悠一和《画册》中福井义治等形象所透露出来的复杂内容，正是促使日本人民在战后严肃考虑问题而坐卧不安。

战后初期以控诉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带给日本民族深重灾难为主题的作品，由于它所描写的战争生活都是作者经历过的，人物的愤恨心情也发自肺腑，因此有较大的感染力，引起思想界的震动，对文化复兴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在表现形式上，侧重于从个人命运和家庭角度揭批军国主义，还缺乏对社会生活的广泛概括和细致描写。同时，由于题材的限制，不可避免地格调低沉，色彩阴暗，尤其对军国主义造成这场灾难的规模、性质，以及产生的社会和历史原因，还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索和剖析。对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很少甚至没有给以必要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

日本军国主义倒台后，文艺领域开始出现了欣欣向荣，百花争妍的可喜局面。从战前起就积极投身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老作家，并没有在生活和创作的道路上停步不前，而是焕发革命的青春，以更为成熟的作品，辛勤地浇灌着日本进步文学的园地。他们根据长期的斗争经历和对生活的理解，塑造的人物形象中都寓托着自己的爱憎。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反过来又给社会以巨大影响。文艺不仅仅反映现实，更重要的是评价现实。文艺作品对生活的任何反映，都包含着作家的立场和审美态度。德永直在《熬煎》中，并不依靠情节取胜，而是着重刻画人物的思想面貌，把笔锋深入到女主人公夏子的内心和感情中去，写出了她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夏子经历过动乱年代，饱经忧患，但对生活和命运始终采取挑战态度，逆流勇进。尽管小说对她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转变过程写得不够充分，但并没有超出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去渲染和虚构，而是对生活中遭受人生熬煎、认识到朴素真理的许多劳动妇女，进行了艺术概括，表现了作家对生活的美学判断。中野重治的《儿女和父母的关系》(1955)和佐多稻子的《干闺女》(1978)，作为进步文学，描写的故事可能平

淡无奇,然而同样表现了作家的爱憎,反映出作者对那些阻碍历史前进的丑恶事物的痛恨和对美好事物的礼赞。小说人物的悲欢离合和喜怒哀乐都与日本的革命运动紧密相联,赋予作品以丰富的思想性。

战后初期,一些作家为了摆脱自从大正年间就在日本文学中定型的“私小说”的传统束缚,曾经在表现形式和技巧方面作了某些探索和尝试,使文艺展现了一定的生机。“战后派作家”是代表人物。他们主张在塑造人物时,打破“私小说”的桎梏,强调“在观念中探索世界和人类存在的意义”,反对描写“人物行为的表面现象,而重视其心理动机”。在手法上宣称要突破现实主义,确立新的表现形式和文体,使用抽象语言。他们当中的椎名麟三是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以擅长写孤独者的内心生活著称。他的《深夜的酒宴》(1946)是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第一篇小说。他塑造了一个孤独冷漠的人物须卷,对一切都悲观失望,“既没有回忆,也没有光明的前途,有的只是一把难堪”,“绝望和死,这就是我的命运”。在运用形象表达自己哲学思想和感情的技巧方面受萨特的影响;在人物塑造、心理刻画、矛盾的展开与冲突等方面,同历来沿袭的“私小说”、“心境小说”等相比,有其别开生面之处。野间宏的《脸上的红月亮》,描写战争给人们心灵留下的创伤,侧重人物内心活动的分析,细致刻画人物的复杂心理,受乔埃斯和普鲁斯特的影响。总的来说,在创作方法的探索和实验上,他们并没突破西方现代派的影响,对外国文化的借鉴还缺乏分析鉴别,有兼收并蓄的情况。但,大量移植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手法,用来表现日本的社会生活,促进文学创作方法的多样化,并把现代派作为自觉的文学运动,还是始于他们。

由于美国执行一条殖民政策,美国文明泛滥于日本,颓废文学日渐抬头。其中“新戏作派”(又称“无赖派”)盛极一时,但命运

不长，不久即销声匿迹。这派代表作家有太宰治、坂口安吾和织田作之助等。他们主要以消极的、悲观的、颓废的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反映战后初期的社会生活，表现资产阶级的空虚无聊和没落的旧贵族找不到出路的苦闷与感伤。他们的作品，大多通过两性关系或男女纠葛，宣扬活着不过是为了谋取官能的享乐，反映了日本资产阶级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和战后群众运动的袭击所产生的幻灭感和世纪末的绝望情绪。此外，以田村泰次郎、井上友一郎为代表的“肉体文学派”，以战后初期混乱颓废的社会现象为主要题材，散布悲观厌世和纵情声色的腐朽没落思想，起了腐蚀人们心灵的作用。

二

战后初期，美国为了打击长期同它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争霸的日本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势力，曾经采取了使日本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措施，以致较多日本作家一时还没有看清美国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后来，在日益加深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教育下，他们不断提高了认识，写下了许多揭露日美统治阶级的优秀作品。日本军国主义战败投降前夕，美帝国主义在广岛和长崎投掷了原子弹，日本文学评论家把控诉美国这一罪行的文学作品称之为“原子弹文学”，是日本作家写不完的一个主题。原民喜的《夏天的花》(1946)和大田洋子的《尸体狼藉的市街》(1948)比较有名。这些短篇真实深刻地描写了美国投掷原子弹所造成的悲惨局面。女作家有吉佐和子在《醉中醒》(1959)和《祈祷》(1959)中，通过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和富于地方特色的语言，揭露了在广岛所造成的血肉模糊的悲惨往事，时隔若干年后还折磨着当时的受害者。小岛信夫的《美国学校》(1954)，开门见山

地把批判的矛头直指驻日美军及其日本追随者，反映了一定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

这种创作倾向在五十年代兴起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推理小说就是侦探小说，叫作惊险小说亦无不可。最初本来也叫侦探小说，因战后实行文字改革，大大压缩了汉字的使用，“侦”字被废，文艺界便根据木木高太郎的建议，叫起推理小说来了。“社会派”推理小说，一改过去单纯侦破案件的写法，采用从不同途径搞到手的官方机密材料，揭露了美国占领日本时期的黑暗内幕，反映了日本资本主义的罪恶，尽可能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展开情节，带有批判的倾向。“社会派”把推理小说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使它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成为日本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之一，并提高了推理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日美统治集团。松本清张的《日本的黑雾》(1960)由十二篇自成段落的短篇联缀而成，以美军占领日本期间所发生的一些重大冤案和暴行事件为线索，采用侦探小说的写法，得出了美国占领者及其特务组织是这些冤案和暴行事件的幕后操纵者或直接肇事人的结论。水上勉的《花的墓碑》(1962)也是由七个各自独立成章的短篇联缀而成，把人物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和复杂的社会斗争里加以刻画，揭露了驻日美军勾结日本罪犯进行贩毒、走私和杀人等罪行。

进入五十年代，许多短篇小说，取材多样，题旨积极，从不同的方面反映日本社会现实。作家的政治视野和作品题材范围不断扩大，小说所展示的生活天地和社会意义日益广泛深远，给读者以不少有益的启示。井上靖的《梦中桧》(1950)是他同名三个短篇中较为出色的一篇。井上靖是日本当代杰出的语言艺术家

之一，正象近代文学史上一些有成就的文学家，无不从民族文学宝库中获取思想和艺术上的养料来丰富自己的血肉那样，井上靖也从日本古典遗产中受到了艺术上的熏陶，以他多采的语汇和抒情手段，丰富了当代文学的语言宝库。温柔亲切的感情，微带忧郁的色调，含而不露的构思，清新隽丽的语言，这本来是井上靖艺术风格的基本特色，在这部短篇中亦有明显的表现。长谷川四郎的《阿久正的故事》(1955)、松本清张的《断碑》(1954)和阿川弘之的《蜡笔画》(1951)等短篇，都以小资产阶级作为作品主人公，并以他们的生活道路和失败命运为中心展开关于时代和社会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小说虽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现象没有直接予以抨击，却在不着文字的地方透露出作者的强烈愤怒。阿久正、木村卓治《断碑》、榎木绫子《蜡笔画》，唯其因为他们安分守己，循规蹈矩，对生活没有多大奢望，就更加典型地表现了在竞争激烈、尔虞我诈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小人物的共同命运。这些短篇所揭示的自然不是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貌，但却通过一角抓住了那个社会的一些真实特征和矛盾，对于打开读者的眼界，了解 and 认识战后日本社会是有所帮助的。

五十年代后期，战后开始写作的现代派青年作家大江健三郎、安部公房和开高健等人颇为活跃，他们不仅对文学界，而且对青年一代的思想也有一定影响。尽管他们在题材选择、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方面并不一致，却有一个共同倾向：不满现实，对未来又惶恐不安。创作上吸收欧洲现代派表现形式，使用离奇的寓意手法来讽刺和描写现实生活，常把现实生活的细节和幻想的情境交织在一起，描写个人的孤独和人在不可思议力量面前的无能为力，表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现象。安部公房获芥川文学奖的成名作《墙壁》(1951)，写一个公司职员突

然忘记自己的姓名，并得了一种怪病，只要用眼睛盯看一件东西就会把它吸进胸腔。他当然被社会视为异端，遭到各种凌辱和迫害。最后被推到地下室，在“墙壁成长调查团”钻进他眼内进行科学研究后，全身肢解，变成了一堵墙。从传统的写法来看，显然荒诞无稽。实际上它反映了在荒谬丑恶的社会现实中，无权无钱的下层人物受人捉弄，人的“自由意志”已经丧失，想寻找“自我”殆无可能。作者笔下的墙壁正是人类一切徒劳无益的反抗的悲剧性象征。《诗人的生涯》(1951)没有连贯的情节，没有完整的人物形象，对白也语无伦次，形式与内容荒诞不经，晦涩难懂。作者用意在于表现陷入荒诞生存条件中的个人，表达对周围世界的荒诞性感受。这个短篇试图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饥寒交迫的悲惨命运。

同样主题和写法也表现在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中。他前期受萨特影响较深，后期对美国作家诺曼·梅勒所鼓吹的“二十世纪后半留给文学冒险家所未开垦的处女地只有性这一领域”起共鸣。他的早期作品如《饲育》(1958)、《人羊》(1958)和《出其不意变成了哑巴》(1958)等短篇小说，接触到了当时日本社会的主要矛盾，从不同角度揭露了美国占领日本期间的罪恶行径，具有一定反帝倾向。大江的成名作《奇妙的工作》(1957)更具有这几位年轻作家的特色。此书描写三名男女大学生为了糊口，替东京大学附属医院屠宰实验用的狗。他们在屠宰工的指导下，双手沾满鲜血干着这件“奇妙的工作”，他们感到自己和这些坐以待毙的狗没有什么不同，认为给即将被宰掉的狗喂食和杀死不抵抗的狗都是卑鄙的。这篇小说使用隐晦沉闷而又有些虚假的想象，迂回曲折地用怪诞的情节，讥讽了当时处于美帝国主义军事占领下的社会现实，表现了弱小者的绝望与辛酸。

日本经济的畸形繁荣，加剧了社会矛盾和精神危机，充满着

荒谬与丑恶。要表现这种与从前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生活，艺术形式也要起相应的变化。这些青年作家在一定意义上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他们笔下的日本社会是那样的荒谬，不合情理，不合逻辑，这反映了当代知识分子苦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谬、丑恶而企图寻找出路的焦躁不安心情。他们使用极度夸张的手法虚构人物形象和情节，予以荒诞化，主观上是为了渲染主题，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冲突。

日本垄断资本在美帝侵朝战争中赚取了高额利润，社会更加腐烂，颓废文学和唯美主义文学进一步恶性发展。石原慎太郎的《太阳的季节》(1955)轰动一时，形成一股“阿飞文学”的逆流。这部短篇小说宣扬道德败坏，描写男女阿飞放浪形骸的生活，反映了资产阶级在经济膨胀过程中社会风尚败坏，道德堕落；说明某些资产阶级作家在群众运动高涨面前，利用小说寄托自己颓废没落的思想感情。

三

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日本经济持续上升，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由第七位跃居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成为所谓“经济大国”。但在畸形发展所造成的“空前繁荣”后面，正充满了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斗争。“新社会派”推理小说描绘了这时期的黑暗、物欲横流和人们的精神空虚。森村诚一的“证明”三部曲，即《人的证明》(1976)、《青春的证明》(1977)和《野性的证明》(1977)具有代表性。这里顺便提一下，进入六十年代后，许多作家专心致志于长篇创作，对短篇普遍重视不够，甚至把短篇看作是余兴之作。因此，短篇数量锐减，质量也有所下降，同战后初期和整个五十年代拿不出短篇佳作就登不上文坛的情况相比，

是不能同日而语的^①。但这不意味着六十年代后就没有好的短篇小说。森村诚一的短篇也同样闪烁着时代光芒和生活气息，具有和他的长篇同样的创作倾向，而更多的是描写工薪阶层饱受生活熬煎和备尝人间辛酸的主题。他的《中途下车》(1974)，在不过五千多字的小品中，以沉郁的笔触和深切的同情，描写了半生穷困潦倒的小职员和走投无路的小店主，受经济危机袭击而彻底破产的悲惨遭遇，反映了经济高速度发展下日本社会的另一侧面，说明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什么人间天堂，在升平气象下掩盖着社会矛盾和精神危机，对于人们全面了解日本社会的真实情况是有帮助的。《虫豸的土葬》(1975)描写循规蹈矩工作了二十三年的小职员被解雇后，遭到社会和家人的唾弃，走投无路之余，跳进陷阱，把那儿当作他的唯一归宿，反映了日本当前中老年职员一旦被淘汰生活就没有保障的社会问题。其他一些社会派推理小说，也从现代生活中提炼出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题材，来展示这一深刻的主题。女作家夏树静子的《来自悬崖的呼救声》和西村京太郎的《和善的诈骗犯》等短篇，都是描写参加人寿保险的小人物，或借助他人之手把自己杀掉，或伪装死去，用来替家属提前弄到保险费，借以糊口度日，从社会生活的一个角落来显示时代面貌的一个方面。

同样主题也表现在另外题材的短篇中。新田次郎的《日向滩》(1971)和远藤周作的《妈妈》(1973)，通过人物的性格、命运和世态人情的直接描摹，来揭露现实社会的黑暗侧面。《日向滩》以朴实哀婉的笔触，叙述了孤苦无救的少女惠津子姊妹二人，因旅游资本家追求利润被迫拆迁，走投无路投海自杀的悲惨

① 篠田一士：《短篇小说的问题》，日本《新潮》杂志1980年2月号 第183—184页。

故事，揭示了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同情人民的疾苦，提出一些与人生有关的社会问题。这部短篇，以诗一般优美的抒情格调，宛转秀丽的文字，给人以清新悦目的艺术感受。《妈妈》是摄取一个生活片断来写的，表现了作家对人间不幸和苦难的较高敏感，迷漫着由此而来的内心不安和痛苦，同时却又激荡着对于美好前景的追求，对黑暗势力的揭露仍然相当有力。这个短篇的悲剧所以能够激起读者的强烈同情，除了妈妈的社会地位和不幸遭遇外，她的善良和不甘消沉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她对儿子的深厚爱情，就更加增添了她的不幸，并且给人以沉重的窒息之感。妈妈的被捕表面上看来是儿子告密所致，实际上是那个万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母子二人互相爱着，却又是造成对方不幸的客观存在，是处在矛盾斗争中的有着深刻复杂性的艺术典型。

以上短篇，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大多没有作正面的讥评，而是使用旁敲侧击或正言若反，就更加发人深思，从字里行间可以寻觅出愤怒之情。

历史小说在六、七十年代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取材于历史故事，却又对历史人物进行再创作，用来曲折地为现实斗争服务。当前日本文坛以“郎”为笔名的三位知名作家，即所谓“太郎、次郎、三郎”——司马辽太郎、新田次郎、城山三郎颇具代表性。他们同某些未能把握住现实的重大题材转而写历史小说以自娱的作家迥然相异，而是借古喻今，把历史上推动政治、经济向前发展的人物，放在一定历史时代革新与守旧势力尖锐斗争的环境中，从各方面来宣扬歌颂他们的“励精图治”和“文治武功”，用以鼓舞日本民族在经济上赶超欧美，跃居世界领先地位的信心。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畸形发展所造成的“空前繁荣”的经济形势面前，日本垄断资本一方面深感自己基础薄弱，经常处于

危机阴影笼罩之下,另一方面又极力鼓吹不能就此停滞不前,而应继续发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甚至扬言“二十一世纪应是日本的世纪”,要变日本为“世界的加工厂”。他们的历史小说正反映了日本社会这样一种思想动向。司马辽太郎的《多谋善断的人》(1964),主人公大村益次郎(1824—1869)是明治维新的元勋之一,是日本近代史上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所实行的资产阶级化的兵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作者从各方面宣扬歌颂大村益次郎的进取精神和乐观主义,用以指出日本和将来的出路,寄托希望于经过他理想化了的人物。

日本经济急剧膨胀,使沉淀在政治思想生活最底层的渣滓——一小撮军国主义余孽心中最卑劣的欲念又浮现出来,妄图重温对外扩张和称霸亚洲的旧梦。反映在文学领域里,出现了一些美化和宣扬战前军国主义的作品。三岛由纪夫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前期作品唯美主义色彩较浓,大多描写病态心理和色情故事。进入六十年代,三岛连篇累牍发表政论文章,恶毒攻击革命群众运动,自觉利用小说为复活军国主义制造舆论。他的所谓“二·二六^①三部曲”——短篇小说《忧国》(1960)、《英灵之声》(1961)和三幕话剧《明日黄花》(1966),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把凶暴残虐的形形色色军国主义亡灵和政治僵尸抬了出来,把它们美化为“忧国之士”和为国捐躯的“英灵”,从思想、作风、性格和气质各个方面,来宣扬、歌颂它们反动落后的世界观。

① 1936年2月26日,在军国主义的策划和指使下,日本法西斯军人在东京发动武装暴乱事件,目的在于建立法西斯军人政府,加紧扩大侵华战争。2月29日暴乱平息。

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三十多年了，日本社会经历了极其复杂错综的变化，处在一个历史性转变时代，生活中不断涌现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作家只有熟悉他所要描写的生活，并且产生深切的感受和激动之后，才能进入创作过程。一些作家投身到革命群众运动中去，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写出了真实反映战后日本社会风貌，揭露从家庭到社会各个角落黑暗现实的作品。这类作品虽属凤毛麟角，但毕竟是文学的主流，代表一种方向。这些作品以细腻逼真的艺术风格，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浓烈真挚的感情，写出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好作品，表明这些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已达到他们世界观和文艺观所能达到的较高水平，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另一方面，有些作家囿于个人的狭小天地，着意描写身边琐事，与战后时代的剧烈变化缺少联系。此外，还有一些作家，或屈从于出版商的商业化要求，或因主观上的局限，写出了大量平庸拙劣，甚至思想反动的作品，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上发达富裕，精神上落后贫乏这种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在文学上的集中反映。

1980年春节于北京

目 录

日本战后的短篇小说(代序).....李德纯 (1)

熬煎德永 直 箫 箫 译 (1)

重逢川端康成 高慧勤 译 (31)

儿女和父母的关系中野重治 文学朴 译 (51)

千闺女佐多稻子 平献民 译 (60)

港湾小镇广津和郎 李 芒 译 (74)

遥拜队长井伏鱒二 **刘仲平** 译 (97)

梦中桧井上 靖 陈淑华 译 (124)

脸上的红月亮野间 宏 于 雷 译 (148)

割草姑娘石坂洋次郎 李成起 译 (175)

深夜的酒宴椎名麟三 孙好轩 译 (201)

画册田宫虎彦 于纯厚 译 (240)

醉中醒有吉佐和子 刘和民 译 (264)

多谋善断的人司马辽太郎 谷学谦 译 (294)

桑孩儿水上 勉 王 凌 译 (345)

输出城山三郎 马兴国 译 (357)

• 1 •